

第一章 棉花传入中国的历史

一、中国文献记载的混乱

中国历史文献中很早已经有关于棉花的记载。再加上近年来出土的新资料，我们可以大致确定棉花传入中国的历史。在公元前二世纪或更早一些，棉花及棉纺织品已经传入中国。但是在宋以前，大约有一千余年之久，棉花的种植始终是局限于边疆的少数民族之间，而未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

中国很早就已经懂得利用丝及麻的纤维作衣料，而且这方面纺织技术已经有高度的发展。蚕丝是连续的纤维，麻是半长纤维，所以中国人对短纤维的纺织原料如棉花及羊毛，很久都不发生兴趣。此外，当棉花开始传入中国时，外国的棉纺织技术，远较中国纺织丝及麻的技术落后，生产棉货既费时，价又高，无法与中国固有的纺织品在市场上竞争。棉纺织本来可以借用若干丝及麻纺织业的先进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不过由于棉纤维的特性，制造棉货需要一两种特殊的工序，这是丝麻纺织中所没有的，故无可借鉴。这些工序就变成了棉货生产中的瓶颈。棉花首先要去籽，然后要弹松，这是它特有的工序。因为棉是短纤维，纺的技术也与丝麻不同。这些技术，最初都很落后。差不多直到宋末元初，才有突破性的技术进展，从此才可以在生产力上与丝及麻相抗衡，问鼎中原。

在当年，棉与丝绸的性质较相近，算是高级衣料品，所以它是直接与丝绸相竞争。不幸棉花传入中国的两条路线上都碰上了丝绸生产中心，等于是碰上铜墙铁壁，一挡就挡了一千几百年，使棉业无法内传。不过有关这一段产业史，中国文献记载十分混乱。

造成混乱的基本原因约有下列数端。

第一，传入中国的棉种不一，而且其中一种，在引入中国以后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没有植物学知识的观察家作出错误的报导。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新大陆（New World）棉种的陆地棉（*Gossypium hirsutum* L.）及海岛棉 *Gossypium barbadense* L. 都是清末民初以后所引进的。在这以前，引进中国的棉花都是旧大陆（Old World）棉种，即非洲棉（*Gossypium herbaceum* L.）及亚洲棉（*Gossypium arboreum* L.）关于后二种的中文译名，中国棉业家尚未取得一致的协意，我们在此暂时采取非洲棉及亚洲棉的译名。这两种棉花都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根据 J. B. Hutchinson, R. A. Silow and S. G. Stephens 三氏研究数十年的结论，非洲棉是最早变成一年生草本的棉种，很早就印度克什米尔以北一带普遍种植，然后由该处向四方流传。亚洲棉则发源于印度的 East Bengal。这种棉种在印度本土直到 13 世纪还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它最初传入中国时，还维持原状，但很久以后，逐渐传入长江流域，由于纬度升高，气温降低，它竟转化成一年生植物，形状也由灌木变成低矮作物。

第二，这两种棉花是经由两个路线由印度传入中国。中国近代经济史家曾经采用“南路棉”与“北路棉”两名词来说明这两条路线，从方位来说，南北两字并不精确，但大体还不太错。北路是从克什米尔以北经西域到达中国西北几省。有关这一路的文献记载相当清楚，比较麻烦的是南路引种的历史经过。它本是从亚洲棉的发源地印度阿萨姆（Assam）经缅甸的北角传到云南西部。从此以后又沿着中国西南边疆而繁殖到闽广。因为闽广是沿海省份，于是使得某些人误会亚洲棉是经由海路从爪哇等地传来。

第三，引起混淆的另一原因是名词不一致。棉与棉布都是由

① J. B. Hutchinson, R. A. Silow, and S. G. Stephens, *The Evolution of Gossypium*, London, 1947.

外国引进的物品，最初的名称都是印度文或梵文名词，最后才音译成汉文名词。不幸的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的译名其多无比。在印度古代，野生棉与栽培棉的名词不同，所以早期的译名与较晚的译名不同。在输入中国的两条路线上都是先经过边疆的少数民族，这样辗转音译，由于方言发音的不同，最后译成的汉文名词，自然差别更大。此外，在印度文中，棉花与棉布是完全不同的名词。北路是先输入棉布，然后再引进棉花，所以译名从布。南路则相反，是先引进棉种，然后再就地织布，所以译名从棉。

第四，中国西南边疆地域原来生长许多土著纤维植物，与多年生木本亚洲棉有些相似之处，而且也曾被当地人民用来织布。在后者传入此一地区后，在历史文献上曾引起严重的混淆。

二、木棉与南方土著纤维植物的混淆

中国历史上被长期而广泛利用的纤维植物是麻类；其次是葛。中国早期称为布者，不外是用麻或葛织成的。麻有不同的种类，都是半长的纤维。在利用麻类织布时，首先要脱胶，将纤维分离出来，然后再将半长的纤维连续起来，称为绩。古代文献对于麻与葛的纺织记述甚多，清楚无误。而且两者与木本亚洲棉，做为植物，并无相似之处，不易混淆。

引起混淆的是一种在南方地区生长的树，在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福建等亚热带省份的土著植物。古代称为槿华树、或木棉；较晚又被称为攀枝花或班枝花。从植物特性与纺织工艺方面来看，它与木本亚洲棉有下列明显的区别。

第一，班枝花树甚高大，可达五六丈高，树干粗，数人方可合抱。枝叶茂盛，能笼罩很大一片地方。而木本亚洲棉是多年生灌木，普通只不满一丈高，分枝不广。文献中称树木高大者是班枝花，如说“树高过屋”；如小桑”；高七八尺”；如柞”则是指木本亚洲棉。

第二 班枝花阔叶如掌形 类似梧桐叶 故称槿树（即桐），

古人列为一类，正月开花，花落然后生叶。最值得注意的是花朵很大，呈深红色（也有金黄色者），十分艳丽。文献中提到“木棉花”者，都是指班枝花，强调此一特色。木本亚洲棉则开花较晚，而且无甚可观，不会引人注目。

第三，亚洲棉棉实成熟后，籽与絮是相连的，要用特种工序将籽与絮分离开，即以铁轴或铁棍碾除棉籽。班枝花的实成熟后，籽与絮是自然分开的，故不需去籽轧棉的工序。

第四，班枝花絮与棉花絮都属于短纤维一类。但是棉纤维有自然的卷曲，彼此互相勾连在一起，纺时先搓成棉条，然后从棉条中抽取纤维，捻成连续不断的纱。班枝花的絮则光滑无天然卷曲，故纤维与纤维之间互不勾连，无法制成棉条，抽取成缕。因为纤维互不勾连，用以做絮胎等填充物则甚轻软，不易结板。

第五，班枝花絮有一特性，就是不吸收水分，泡在水中数小时后重量丝毫不增加。在西方，它最理想的用途是用来填充航海用的救生圈及救生衣。

在历史文献中最引起争议的是：班枝花絮究竟能否用以纺纱织布。早期文献屡有西南边疆民族织成檀华布之记载。但另有许多记载说汉族妇女都无法用班枝花絮织布，只有用以填被褥者。从理论上讲，班枝花絮纤维无捻曲，互不勾结，是无法搓成棉条，更不能纺成纱。

近来，学者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个中国纺织史上的大疑团。班枝花絮可以织布，而且有的学者亲见这种织物，并且镜检过。^①这种实物证明是不可否认的；不过，织做班枝花布需要特殊的工序及技术，光绪《云南通志》引《顺宁府志》中的物产说：

于绍杰：《中国植棉史考证》，载《中国农史》1993年2期，第31页；及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载《文物》1979年8期，第51页。

“木棉花，俗名扳枝花，山箐内常有之，枝干粗大，枝叶稀疏，叶如核桃树叶，花似山茶，花可食。花谢结成蓓蕾，至四月间如大拳，烈日曝开，其子带绒飞出，宛如柳絮，漫天飞舞。其绒长一二寸，洁白有光，胜于竹棉。好事者收取十数觔，装入筐。其子不用车压，只用手在筐内徐徐搅之，子在下，绒在上。装裯褥暖而温”。这说明班枝花絮之纤维与籽自然脱离，免掉轧花一道工序。其纤维无天然捻曲，要用人工使之发生捻曲。有人观察过黎族妇女操作，把班枝花絮一丝丝地接起来，放在腿上搓捻，用左手转动一端装有泥饼或铜钱的小竹枝做的纺锤，卷成纱锭。

这样的工序，可以解释我们许多疑团，黎族妇女用人工搓捻，造成班枝花的捻曲，把纤维一根根接起来，所以古文献中称“绩成橦华布”，而不说纺，这一点很像绩麻的工序，不过更加费工，因为麻是半长纤维，而班枝花絮则是短纤维，一根根接起来需要更多人力，更重要的是，用人工造成的纤维捻曲究竟不如天然捻曲牢固，纱线在强大张力下，靠人工捻曲连接处很容易脱开，因此班枝花捻成的纱线不能用纺车纺，而要用原始的纺锤来纺，以避免过度的张力。这种纱线更不能上织机，尤其是不能供做织机上的经线。想来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只能用最原始的编织方法来织黎布或橦华布。这也是效率低，费人工的生产方式。近年研究者所观察到的黎族妇女大体未脱这种原始的工艺，除了改编织为使用腰机。腰机的张力不大，但幅宽很小。

使用编织的生产方法，则幅宽不受两臂距离所限，所以古代的橦华布都是幅广五尺的宽幅布。宋时赵汝适的《诸蕃志》中称此种布为“黎幕”，范成大称之为“黎单”，都是指其为宽幅布。一

于绍杰：《中国植棉史考证》载《中国农史》1993年2期，第31页；及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载《文物》1979年8期，第51页。

直到今天，观察者也说黎布用于作被子。

班枝花纤维靠人工捻曲来连接。人工捻曲不但不牢固，也不耐久。时间一久，人工捻曲便自动恢复原状，变成无捻曲的纤维，布就破裂。据今人实地观察所得，黎布所做的被子二三年就破了，这当然不是磨损而破，而是因为纤维丧失捻曲而脱开。

班枝花布除了能做夷人服用的包头布及贯头衣（一种极简单的套头装），^②而不能做剪裁复杂的汉人衣服。这一来是因为纤维连接不牢，不便剪裁缝纫。二来是因为班枝花絮绝不吸收水分，做成贴身衣服不能吸汗，令穿用之人觉得不舒服，久之甚至会得皮肤病。即令是做为填充物也有这种毛病。有人竟误以为此花纤维有毒。清人谢翰的《木棉辨》即说此物：“土人言绵性有毒，抽丝脆弱，易断难续。即裯褥亦不可用，有风湿人卧之，成癩成疯也。”

总之，班枝花絮不是良好的纺织纤维。由于无自然卷曲，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纺与织，十分费工，产量有限。而汉族人民二千多年以前就会使用纺车与织机，对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制做班枝花布的落伍技术没有兴趣，没有人去仿效。到了明清，即令是沿海闽广的汉人，也很少听过或见过这种布及其织造工艺。只有深入蕃夷社区才能见到，是夷人特有的产品。其次，这种布在历史上也没有内销的记载，唐代长安已有很多售卖棉布的白叠店铺，但是未闻有售卖槿华布的店铺。这主要是因为此种布质量低劣。它唯一引人注意的特长是幅广色白，班枝花絮是天然的纯正白色，比本色棉布更洁白。但是此布很不实用，不能剪裁缝纫，粗疏易坏，颇不耐用，不及内地生产的丝绸及麻葛纺织品，更不及后来传入该地区的棉织品，所以逐渐被淘汰。

不幸，班枝花织布的这段历史却使研究中国棉纺织史的人受

于绍杰：《中国植棉史考证》，载《中国农史》1993年2期；及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载《文物》1979年8期。

《汉书·地理志》说海南岛珠崖郡一带之人“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就是一大块布，中央挖一个洞，套头穿上。

到困惑，产生长期的混淆。现在我们可以根据班枝花布的特色及工艺，使两种植物纤维的产品得以区分，消除混淆。另一方面，班枝花布是在棉花引种以前，中国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布类之一，可以把中国的纺织史向前推溯一段时间。

考古学家张秉权先生曾经在小屯殷虚出土龟甲上发现若干黏附的纺织品碎片。^① 张先生判断这些纺织品是当初用以包裹龟甲的，不是后人掺入的。两次检验的结论不同。一次用电子显微镜鉴定，认为纤维有天然捻曲，与棉纤维之特征相同。第二次检验则认为‘似乎不是棉’，‘更像似丝的纤维’。张先生认为这是商朝武丁时代的纺织品，但在没有排除是丝纤维以前，尚无法肯定是最早的棉纺织品。

另据近年考古人员在福建武夷山莲花峰西侧一个崖洞中发现的船棺葬，^② 棺内原为死者穿著的纺织品残片，共有四种质料，即苧麻、大麻、丝、棉布。据化验，棉布是属于灌木型亚洲棉的纤维。对船棺木质进行碳 14 测定的结果，树干校正年代为距今 3445 ± 150 年。问题是：棺木的年代鉴定不能代表棺中陪葬物的年代。这是一具船棺，由整棵巨木挖成船形，做为棺木。这种巨木多半是千余年的大树。如果是 1500 年的大树被砍倒，制成船棺，则入葬之时距今只有两千年左右，这与亚洲棉输入中国南方的时间就很接近了。因此，我们尚不能据此出土实物断定殷商时期已有亚洲棉之种植，或有棉布输入进口。

在文字记载中，最早的是《尚书·禹贡》中的一句话：“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大家似乎都同意，“岛夷”是指海南岛的黎族人。“卉”一般解释为‘草’。但班枝花树十分高大，不得称为草；即令是灌木型的亚洲棉也不能算是草，能称为草的有麻类葛类，或

张秉权：《小屯殷虚出土龟甲所黏附的纺织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1。

《关于武夷山船棺葬的调查和初步研究》，载《考古》1980年第6期，第26页。

是海南岛特有而为中原少见的草类纤维植物，究何所指，已难肯定。

真正含义明确的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卷七十六《南蛮西南夷传》：“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珠崖即今海南岛崖城。广幅布即橦华布，也就是班枝花布。当地人民在公元前一世纪已能织造。孙幸要征调进贡，因需索量高，而此布费工费时，当地人民无法供应，竟而反叛杀掉孙幸。

东汉以后，关于班枝花布的记载出现多处，称之为橦（桐）华布。东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说：“永昌郡，古哀牢国……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曰桐华布。”《后汉书·南夷传》“哀牢夷条”也说：“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晋人所著《罗浮山记》说：“木绵正月则花，大如芙蓉，花落结子，方生绵与叶，其子内有绵甚白，蚕成则熟，南人以为缊絮。”郭义恭撰《广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国有白桐木，其叶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也”。左思《蜀都赋》中有“布有橦华”之句，刘渊林注曰：“橦华者，树名橦，其花柔，毳可绩为布也，出永昌”。足证晋时人很多知道橦华布，并且一致强调其幅广、色白，而且是“绩”，不是“纺”。

到了宋朝，亚洲棉已在中国南方广泛种植，记述橦华布的笔记就少见了，往往两者有混淆。赵汝适的《诸蕃志》称之为“黎幕”，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说：“黎单，黎人所织，青红间道，木棉布也，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都是强调是黎人所织，幅广，故称单称幕，只用以为卧具。

唐诗中偶有“橦布”之句，例如王维的“橦布作衣裳”，及“汉女输橦布”，但恐怕难做剪裁复杂的衣裳。也有诗句是欣赏班枝花的艳丽，如张籍的“木棉花发锦江西”。张籍是四川人，而川西正是班枝花树产地之一。后来，单独描写班枝花的诗不断都有。

例如宋人刘克庄《潮惠道中》一诗曰：“几树半天红似染，居人云是木棉花”。以及元人陈孚《思明州》之诗：“遥望天边红似火，瘴云飞落木棉花”。

明清人士的记载在这方面最混淆，原因有下：班枝花树最早称槿树，后来又有人称为木棉，等到木本亚洲棉传入南方各省，也有人称之为木棉。到了宋元之际，亚洲棉从闽广传入中原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广泛种植。江南地区比闽广的温度为低，亚洲棉由多年生灌木蜕变成一年生的草本棉花。但是这种蜕变后的一年生棉花具有许多优点，再加上中原地区有经验的农民加以挑选改良，变成比当年灌木型的母本更优良，结果一年生的亚洲棉又回过头来取代了多年生的灌木型棉种。到了明朝闽广地区已见不到原来的木本亚洲棉。然而许多人听说过在闽广地区曾经有棉花长在树上，可是来到闽广又找不到真正的木本亚洲棉，便误认为班枝花就是大家传言树上长棉花的树。有人将信将疑，有人亲自试用班枝花絮纺织，发现不能牵引抽丝，于是大感困惑。

这种混淆，即令最有名的学者如李时珍及徐光启，都在所难免。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就说过：

“吉贝之名 独昉于南史 相传至今不知其义”。意是海外方言。小说家所谓木棉，其为布曰城布，曰文縠，曰乌骊，曰班布，曰白 𦍋、白縠，曰屈 𦍋者，皆此。故是草本。而吴录称木棉者，南中地暖，一种后开花结实，以数岁计，颇似木芙蓉，不若中土之岁一下种也，故曰十余年不换，明非木本矣。吉贝之称木，即禹贡之言卉，取别于蚕绵耳。闽广不称木棉者，彼中称攀枝花为木绵也。攀枝花中作裯裯，虽柔滑而不韧，绝不能牵引，岂堪作布 或疑木绵是此 谓可为布而其法不传 非也。吴录所言木棉，亦即是吉贝，或疑其云树高大，当是攀枝，不知攀枝高十数丈 南方吉贝 数年不凋 其高丈许 亦

不足怪。盖史所谓林邑吉贝，吴录所谓永昌木绵，皆指草本之木绵，可为布，意即娑罗木。然与班枝花绝不类。”

徐光启可能已经来不及见到南方的真正木本亚洲棉，但其推论大体不差。指出班枝花絮不能纺织，也是事实。

明清之际，有许多人亲到闽广，实地证明班枝花确是不能织布。例如明张萱在《疑耀》中说：“余乡多木棉。集韵，棉作绵。树高者至于十丈，其枝如桐。叶如胡桃叶而稍大。花如今之玉兰花，红如渥丹，一树常数千枚，春夏放花，絮红燄烛天。花谢乃结子，剖之如酒匜。其壳坚硬，其中有絮皓白，故曰木棉。今名攀枝花。……今止充裯褥而已。……第余乡既未有以木棉为布者。即询之海南诸蛮，亦不知其制为何似。”又如张士泽的《梧渚杂佩》也说：“木绵一名琼枝，其高数丈，树类梧桐，叶类桃而稍大，花色深红类山茶。春夏花开满树，望之烂然如缀锦。花谢结子，大如酒杯，絮吐于口，茸茸如细毳，旧云海南蛮人织为布，名曰吉贝。今第以充裯褥，取其软而温，未有治以为布者。”明王世懋的《闽部疏》中说：

“昔闻长老言，广人种棉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余初未之信。过泉州，至同安，龙溪间，扶摇道旁，状若榛荆，迫而视之，即绵花也。时方清秋，老干已著花矣。然不可呼为木绵。木绵者，高树丹花若茶，吐实蓬蓬，吴中所谓攀枝花也。杨用修具载丹铅以为异，曰云南阿迷州有之，闻岭广尤多。不知惠安已载此树，名为攀桂花，杨乃曰班枝花，与吴中攀枝花，盖三名一物也。”

王世懋是 16 世纪中叶的人（1536—1586），此时尚能见到木本亚洲棉残留闽中的情形。但已不是人工栽培，而是道旁野生野长的。这也是南方木本棉花最后的记载。清初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下卷提到：

“木棉树大可合抱，高者数丈，叶如香樟，瓣极厚，一条五六叶。正二月开大红花如山茶而蕊黄色。结子如酒杯，老则坼裂有絮，茸茸与芦花相似。花开时无叶，花落后半月始有新绿。其絮土人取以作裯褥。余买数斤归，欲效绵花制为布，女工不能治。海南蛮人织以为巾，上出细字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贝，即古所谓白叠布，杜诗光明白纈巾即此。今询之粤人，亦无有织作者，或别是一种。广州阅武厅前与南海庙各有一株，甚大。开时赤光照耀，坐其下如入朱明之洞也。”

吴震方的描述与《群芳谱》所记完全吻合：“班枝花，树大可合抱，高四五丈。叶黄，花红如山茶，而片极厚。一名木棉，出南方，俗讹作攀枝花。”有的记载，甚至指出此种花絮容易引起皮肤病（因其不吸水分），即令制作棉絮胎亦不适宜。谢翱《木棉辨》说此树是：“粤西梧，浔，南、太，处处有之。大者合抱，高数丈。木似桐，色灰白，微微晕绿。傍枝就树身层层横出。横出之枝，复抽枝上耸。二月开花，花在枝尖，如玉兰而大，瓣亦厚过玉兰。殊红色，远望则猩红万点，照耀天外。叶随花长，如胡桃叶。花卸结角，四月开拆飞绵，白如鹅毳，著物生虫。土人言绵性有毒，抽丝脆弱，易断难续。即裯褥亦不可用，有风湿人卧之，成癰成痼也。”不过，清初屈大钧的《广东新语》，所记则略有矛盾。其文如下：“高十余丈，大数抱，枝柯一一对出，排空攫拏，势如龙奋。正月发蕾，似辛夷而厚，作深红，金红二色，蕊纯黄六瓣。望之如亿万华灯，烧空尽赤。……子大如槟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绵飞空如雪。然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絮以褥以蔽膝，佳于江南芦花。或以为布曰縠，亦曰毛布，可以御雨。”他又说乘舟沿西江而上至端州（肇庆），夹岸多是此树，花开时“烧空尽赤，染波欲红”，煞是好看。班枝花絮不吸水，如果能织成布，应当是制雨衣的理想材料。但是他前面说“可絮而不可织”，又是用何法织成布则语焉不详。

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中也是夹缠不清。他说：“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贝树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木……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织布。……今粤中木棉树（按即攀枝花）……正南史所云吉贝树也”。在云南地区也有班枝花树，清乾嘉时，有名檀萃者曾在云南元谋县作官多年，其公署周围就有班枝花树，故得以亲睹，并在其《滇海虞衡志》卷九写道：“扳枝花者木棉花也。金沙江热地方多有之……树高大亦如粤，但花色微淡，且稀疏，……其花可以炙食，花卸结角如大肥皂，裂开则柳絮轻盈……其茸甚滑，而病于太短，不能如吉贝之易缕牵连……今永昌无槿木，止有扳枝木”。

以上所述木本亚洲棉与班枝花的混淆，直到近年，经过学者专家深入研究，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观察，才得以澄清。班枝花布因为缺点太多，早已没落，不久可能彻底被淘汰，只对于中国棉纺织史之研究，有一些意义。

除班枝花以外，西南边陲还曾经有一两样其他植物纤维织的布类。其一是桂布，或称桂管布，在唐宋以前出产于桂林地区，故得名。据《太平御览》卷八二〇引沈怀远之《南越志》说：“桂州丰水县有古绿藤，俚人以为布”。裴渊在《广州记》中说：“蛮裔不蚕，采木绵为絮，剥古绿藤绩以为布”。裴氏是北魏或较早时代的人。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则记岭南道广州信安县：“又有钩绿藤，南人绩以为布”。两者似指一物，似乎是一种藤类之皮内纤维剥下后绩成缕。《太平广记》卷一六五“夏侯孜条”记载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夏侯孜为左拾遗，尝著绿桂管布衫朝谒，文宗与满朝官员竞相仿效。白居易诗中有“吴绵细软桂布密”及“膝冷重装桂布裘”之句，似乎桂布厚重御寒。唐以后却再也无人提起此物。

四川在汉时生产一种黄润布，因此布精细，贵重，卷成小卷放置在小竹筒内，算是包装，故又称筒布。扬雄的《蜀都赋》中说：“筒中黄润，一端数金。”可见其名贵。司马相如的《凡

篇》则说：“黄润纤美，宜制禅。”有的文献将黄润与槿布并提，想来是两种不同的纺织品。据说这是苧麻布的一种，强拈成细纱，上机前用滑石粉上浆，织时“行梭滑而布以紧。”这种纤细紧密的布，一端四尺余，重量很轻，可以放在小竹筒内承装。

以上所述各种布类，都是利用中国土著植物纤维织成的。棉布则是从印度及巴基斯坦传入的纤维植物，分别从南北两路引种。

三、由西域传人的棉花

有关这一路线的植棉史，文献记载比较清楚，再加上近年来的新疆出土文物的证明，可以说大体也成定论。它开始传入的时期可以推到公元 2 世纪，再早便没有记载了。传入的路线则是沿着当年有名的 Silk Road 不过反方向而已。也就是从西巴基斯坦，进入新疆吐鲁番盆地、阿斯塔娜，于田，哈拉和卓、喀什等地，然后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最后到达陕北一带。引入的品种是一年生的非洲棉。这种棉花所需生长季短，喜干旱气候。上述路线沿线的气候条件正好适合这些特点，可以一路引进。

从西域引进的棉花及棉布，在译名方面相当统一。在已知的许多译名中，有一个系统是从梵语 Patta 演变出来的。Patta 的原意是“条”、“带”。纺织业发生后，它的含义便被引伸为织成的布幅。古印度文献中称中国的丝绸为 Cinapatta。Cina 是中国，跟“支那”差不多，Patta 就是布。二字合到一起就是中国布，也就是绢绸。在印度古代，棉布比较普遍，所以当 Patta 一字单独使用时，通常总是指棉布而言。这个名词音译成中文计有下列各种：白疊、白疊、白𦍇、白𦍇、钵吒、帛疊、白荅。中国一向有简化外国名词的倾向，于是从以上各词又衍生出：疊布、𦍇布、荅布、榻布。中国古代字典中可以找到两条有关的记载与说明。唐义净的《梵语千字文》中将 Patta 译为中文名词的“绢”。这个翻译不很妥切，所以同书后来就采用音译“钵吒”，这是和尚们最熟习的两个

字音。到了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六十则解释较详：“钵吒，唐言纒条，即是一幅氍也”。这样就把 Patta 的原义及引伸义都说明了。

中国文献中有关西域一带的棉花及棉布的记载，绝大多数都是采用这一系统的名词，使用白疊或类似的音译。而且棉花及棉布在译名上没有甚么区别。这似乎显示，在西域方面是先输入棉布，然后再引进棉籽，所以在名词上都从 Patta 一词而来。

《旧唐书·高昌传》记载说“有草名曰白疊，人采其花织以为布”。姚思廉的《梁书》卷五四《西北诸戎传》所写较详：“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纒，名曰白疊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南史》卷七九《高昌传》也有类似的记载。高昌即吐鲁番，唐贞观十三年平高昌，置西州都督府，属河西道。因此，唐《六典》则记载说“西州出白氍。”可见那个时期，棉布已不是印度来的入口货，而是高昌当地的出产，商人然后用以对外交易。西域境内，高昌以外，其他各地也有使用棉布的纪录。《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康国”条下说：“其王素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疊。”《北史》卷九七及《隋书》卷八三所载雷同。可见魏晋时这些小国中，棉布还是珍贵的衣料，国王及贵族服用。当地也许还未自行大量生产棉布。唐朝的僧侣前往印度取经，都是走西域这一条路，所以他们在形容西域及印度诸国衣饰风俗时，也是采用这一系统的译名。例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斑氍衣”；《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土地所出，唯有氍布”；“南天竺国土地所出，氍布”；“西天竺国，土地所出，氍布”；《玄奘大唐西域记》：“其所服者，氍布等”；“迦湿弥罗国衣白氍”；“滥波国多衣白氍”；“半奴嗟国多衣氍布”；“乌休那国多衣白氍”。

近年来新疆有许多新出土的文物，完全证实了文献上的记载，而且还把生产棉布的时期向上推了一段时期。1959年民丰县北大

沙漠中发掘出来的东汉合葬墓内，^①有各式各样的纯棉织物。其中合葬的男女尸还穿着棉布衣物。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娜出土晋墓中也有棉布衣物。该地另一古墓中找到一张公元551年书写的借契。所借之物中包括六十疋叠布。^②可见此时高昌地区已普遍植棉织布，才有这样大量的棉布借贷。新疆于田一带也有类似的发现。另外还有一张出土的文件，是贞观十九年当地驻军发付叠布口袋若干条的纪录。既然能大量供应军用，想来一定不是进口货。

最重要的发现是1959年在新疆巴楚县脱库孜沙来遗址的晚唐地层中找到的一些棉籽。经过专家鉴定，这些棉籽是一年生的非洲棉。中国有时称之为草棉。草棉的棉铃很小，故又称小棉。因为棉铃小，每亩的产量很低。此外，它还有某些缺点，纤维过短，只能纺粗纱。花与籽附着坚固，脱子不易，但是它有一项好处，那就是生长期短，只要130天就可成熟，因此，可在中国西北一带种植。

根据史料，我们可以断定，由这条路线引进来的棉种传播很慢。7世纪时还局限于吐鲁番盆地一带，直到12世纪初才通过河西走廊传到陕北，元孟祺，在1273年奉旨编刊的《农桑辑要》卷二说：“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种于陕右。”这样缓慢的推移，一来是因为棉种品质差，每亩产量不高。而且中国西北各省，天气过分干燥，不适合棉纺织。因为空中湿度不够，棉纱容易断，只能纺织较粗糙的棉布。更重要的是棉花引种，愈向内移，愈碰到丝织业的强大抗拒力。中国早期的丝织业重要中心地带都在北方。汉在长安设有东织室及西织室，拥有织工数千人，大规模生产。唐时又成立了织染署，下辖25个“作”。由此路线传入的棉花，到了陕北便已达终点，其竞争力无法侵入关中平原。到

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及王炳华：《盐湖古墓》。

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

了明清，由南方传来的较优良品种取代了西北各省的草棉。到了廿世纪，中国境内只能偶尔找到残留下来的草棉品种。民国初年，陕西韩城还在种植这种短绒草棉，当地的名称是“柴棉”。^①用以织布，它的品质较其他棉种低劣，但其优点是适于作棉絮。因为它的纤维短，做成棉絮不易结板，年深日久仍能保持其松软状态。故当地人以此制棉衣、被褥，经久耐用。到了抗战时期，甘肃境内偏僻的地方也偶尔发现种草棉者。

四、由云南传入的棉花

有关中国西南各省种植棉花及纺织棉布的文献甚伙，但也最是纠缠不清。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献整理出来，仔细研判，可以发现下面几件重要事实。第一，由这条路线引进棉种大概比北路棉要早。第二，所引进的棉种是木本多年生亚洲棉。而且最初还是野生棉，尚非栽培棉。第三，有关的名词很混杂。而且从名词使用来看，很可能是先引进了棉种，然后才有棉布出现。第四，棉花引种及棉纺织工作从云南边境开始，向四方扩散。但是从云南向西川一线的发展，受到了强大的阻力，于是被迫沿着中国的西南边疆向东发展，盛行于该地区少数民族之间。

在汉朝初年中国有一条通往印度的捷径，那就是由四川经滇西，通过缅甸的北端而进入印度的阿萨姆。印度的阿萨姆一带正是木本亚洲棉的发源地。这种植物品种便被人沿此路线带入中国境内。最先到达的区域就是云南缅甸边境上的“哀牢夷”居住区。这个部落后来被汉朝征服，设永昌郡，即今保山、永平两县地区。

最早提到哀牢夷植棉之事的文献，是四世纪中期东晋人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不久以后（5世纪前半期），范晔撰《后汉书》，也参考了常璩的记述。其卷八六《西南夷传》“哀牢夷”条说：“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毼帛罽，兰干细布，

^①《纺织周刊》，第一卷二十期，第510页。

织成文章如绫锦”。

很明显，永昌郡当年是贸易孔道，各方民族杂处，有印度人（身毒）缅甸人（漂越）裸裸人（裸濮）等。亚洲棉种传入此地是很自然的事。《后汉书》中，除了引用有关桐华布的记载，还提到“帛叠”一词。据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帛叠是白叠花布，也就是棉布。

在叙述木本亚洲棉向内地传播的历史以前，先要把几个有关的译名加以澄清。野生木本亚洲棉的梵文名词是 *Salmali*。其棉所织成的布叫 *tula*。这些名词后来经过辗转音译就产生了好几个不同的汉文名词。佛经中有“设拉”一辞，唐释玄应在《一切经音义》中解释说：“郎答反，树名也，如皂荚树类，而角甚长，里中有絮如绵，名妬罗绵，堪以为衣者也。”南宋释法云所撰《翻译名义集》中则有一条：“兜罗绵，或名妬罗绵。妬罗，树名，绵从树生，因而立称，如柳絮也。”“设拉”又被译为“娑罗”，不幸“娑”字有时被误书为“婆”，于是又变成了“婆罗”。唐樊绰的《蛮书》在云南管内物产第七项下说：

自银生城，杯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不养蚕，唯收婆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组织为方幅，裁之笼头，男子妇女通服之。《新唐书·南诏列传》“南诏”项下则写道：“太和、祁鲜而西，人不蚕，剖婆罗树实，状若絮，纫缕而幅之。”《太平御览》卷九六一引用了这些记载，但是把“收”字误为“牧”字，与婆罗相连，而成“牧婆罗”，其条如下：“南诏多牧婆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幅，裁之为笼段，男子妇人连（通）服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上述各书都已把“娑”字误刻为“婆”字。但宋明学者还是有人看到正确原文者，南宋祝穆在其《方輿胜览》中说：“平缅出娑罗树，大者高三五丈，结子有绵，纫绵织为白毡兜罗棉”。树高三五丈是过甚其辞。不过他已把兜罗棉与白毡直接关连起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南诏诸蛮不养蚕，惟收娑罗木子中白絮，纫为丝，织为幅。名娑罗笼段。”